

中国现代第一代女作家

— 作为女儿书写

盧昇淑*

<目 錄>

- I 序言
- II 本文
 - 1. 平等的“人”，差异的“女性”
 - 2. 作为女儿的新女性对于母性和自身再认识
 - 3. 她们的挫折
- III 结语

I 序言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它宣告古代的文艺精神告一段落，探索新的文艺精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五四带来的文化运动轰动了几千年来安静的整个中国，其影响自然波及到女性思维圈里。五四前夕微微波动的女性意识，从此得到觉醒而崛起。作为民国的国民（女国民），作为祖国的女儿，作为与旧势力争斗的力量女性逐渐登上社会各个角落。特别是女性在话语圈里的发挥真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该时期活动的女作家群成为第一代女作家，区别于五四退潮时期到30年代初期的第二代女作家和之后的第三代女作家。这也难免具有以时代为区分的融通

* 신구대학 비즈니스중국어과 교수

性，不过时代带给她们的主·客观的影响也起了不能轻易磨灭的作用。因此，本论文里还是以这个概念来统称现代女作家。在这里主要探讨第一代女作家和母性的关系。母性是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单一的母性性设定违背文化历史发展的前提轨迹。再加上，现代文学是连接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一座桥梁，东西文化全面接触的“集合场”。该时代关于母性的思索也是在所谓新旧文化和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转折点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第一代女作家的出发点就在这一文化转折点上。所以，她们的文本里母性话题的探讨也需要在这些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解读。如果这是文本解读的宏观背景，她们的自身背景是微观背景。应该注意她们拥有的两种身份的矛盾。首先，她们作为“女性”的女儿身份。作为女儿谈母亲或母性性的时候以女儿的眼光为中心，叙述的“我”和被叙述的“母亲”之间已经有一定的叙述距离，自然形成了一种间接的书写方式。其次是，“潜在的母亲”（未结婚的女姓）的身份，她们都是以往后当母亲为前提而存在的女性。她们的两种身份（女儿和潜母的身份）是作为独立的女性站脚必须克服的前提。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第一代女作家在两种身份的矛盾中关于母性的书写。

II 本文

1 平等的“人”，差异的“女性”

五四时期，女性解放思想日益系统化、理论化，不断更新、完善。主要出现过女性人权说、女性解放说、女性支柱说、女性独立说等学说²⁾。这些思想基于男性先驱者们——比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沈雁冰、田汉等——在封

1) 已結婚的女性是具体的母親；以下簡稱具母。潛在的母親簡稱潛母。

2) 李敏、王福康《中国妇女学》，120—12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作者接着提出道：“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妇女在经济和政治都取得了与男人平等的权利，然而在意识和观念上妇女却依然受到种种歧视和压迫”。

建和新思想的冲突中首先提出的“人的觉醒”，唤起了对于女性的关注，从此以后女性在作为“人”的立场上被考虑。该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纳入了社会革命的轨道，自始至终就不是女性问题单独的运动，而与男性革命的思想宗旨同步：“当初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争取经济独立和政治平等”³⁾。比如，作为“人”的女性在阶级斗争中漠视了“性”的特点，她们与男性一起对抗旧势力的集体意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把女性的问题看作融通的“人”的问题，却忽视了男女两性之间的阶级问题，孕育了五四以后女性群体对女性解放意识的重新觉悟。另外，需要加以考虑的一点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出现了“女性”的词汇。

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夫人，不过扶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是伏于他人的；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性。虽然“女子”也称作子，但其用意和男子这“子”不同。（……）所以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所谓“阴卑不得自尊，就阳而成之”（白虎通嫁娶篇）女子一生的最高标准，便是嫁人了。古妇人无名，系男子之姓以为名；妇人无谥，因夫之爵以为谥：在社会上的地位如此⁴⁾。

中国古代，女人的称呼大约是三种；女子、妇人和夫人，女子是“潜母”的称呼，妇人和夫人是“具母”的称呼。这三个称呼表明着受男子、男人约束的女人的地位，她们没有人格即“未完者”，获得男人的帮助而才完成“人”。她们的“人”，永远是男人所谓的“特定的人”，虽然成了“人”，但也是没有独立的“人”。封建社会里母性的性别是作为女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人”的档次，但与男人相对来说是永远的“次等人”。在这样的意义上，五四对“人”的概念有所发展变化。五四的“人”来自西方启蒙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像上述的解释，男人和女人都是作为“人”平等自由。与此同时，在文艺界领域里五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了“女性”一词。

“女性”反应了这时期反孔话语中的一个主体位置 (subject position)，是一个充满了反叛意义的符号。“女性”是现代西方化白话文学中的主题，它的内

4)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2页，商务印书馆，(1937, 5) 1998, 影印第一版。

涵自然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解接受。“女性”和与它相对的“男性”的内核是性别（sex）。“五四”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性二元论（sex binary），性别成为人格的基础，妇女则成了一个性学（sexological）范畴——“女性”。（……）但是“女性”还包含着负面意义。（……）如“女性”的被动、柔弱、智力上的无能、生理上的低劣，等等。（……）当时女作家也难以摆脱这男优女劣的性二元论——“没有一个主动的、独立与男子的、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能够在性二元论下生存”。（……）在任何一种话语中，“女性”的内涵总是小于（甚至劣于）“人”的内涵，以“女性”来界定的女人必将是一个被缩减、被降级的人⁵⁾。

当时社会话语中的“女性”一词，很能代表当时中国女作家所面临的文化遭遇。女作家拥有作为反叛的势力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正面意义，同时也拥有着女性局限的二等作家写作的反面的意蕴。如果说，“人”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是漠视女性特点的无性别话语，那么，“女性”一词是具有性别意识辨别性的女性话语。不考虑男女性别的差异，在融通“人”的意义上进行的女性解放，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女性的实际，未关注被贬低的女性性别特点。与其相反，“女性”的意义虽然这一词的负面意义开始，但是女人不仅仅在“潜母”和“具母”形象之间徘徊，而是作为独立的性别开始反叛男性。因此，大部分第一代女作家心目中的“母性”是封建女人内质的代表，对作为“女儿”的新女性作家群来说，“母亲”是同情而要克服、赞扬而要做到的对象。

总而言之，中国女性由于男性先驱者们的帮助，从几千年的沉睡之中苏醒了。从鸦片战争开始酝酿的女性解放思想，到了第二次高潮形成了“女国民思想”，在五四时期，从“人”的角度审视女性产生了以“人”为中心的女性解放思想。由此可见，近现代女性解放思想均受到男性先驱们的思想唤醒而逐渐成立。在五四的另一角落，头一次出现了“女性”一词。“女性”一词的出现带来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女性解放思想，造成了女性解放思想的“个人化”趋势，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历史阶段，给女人赋予了与男性不同的另一种性别特征和身份，从而自然形成了女人向自身内部深思的文化气氛，文革时期中断的“两性差异”的话语，到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

5) 鲍晓兰 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266—267、27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妇女”一词，由于早期共产党人批评“女性”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把英文“woman”翻译成“妇女”，因此这个词左翼政治意义浓厚，参阅267—270页。

涌进,重新开始受到注目了⁶⁾。五四退潮时期,早期共产党人的鼓励促进了“妇女”一词的产生,“妇女”直接继承“女国民”意义,以“妇女”为代表的女人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典型女性形象,以后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妇女意义的极端表现,产生出雄性化女性的代名词“铁姑娘”。就这样,“妇女”一词或紧或松地与政治继续保持着联系,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女性形象历程。

2 作为女儿的新女性对于母性和自身再认识

新女性的生存压抑和走上新生的苦难历程,表现了她们在自我觉醒以后所进行的精神扩张。大部分第一代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几乎都没结过婚,处于“女儿”的身份而写作。“学院里的女儿”是第一代女作家的最大特点。她们置身的学院文化是当时的时局里最容易接触西方先进文化的空间,年轻未婚女子的身份状态也给她们提供了向往新文化的积极热情。五四运动以前女性教育处在萌芽阶段,1916-1917年,全国女中学生人数为724人,1922-1923年全国中学女生人数占学生总比的“3.14%”、男女师范学校的比率是208:67,据1922年全国统计,兼收女生的大学中女生只能占“1.99%”,1918-1920三年时间留美女学生占留美学生总人数“8.7%”⁷⁾。上述的统计资料表明,五四前后女性教育的情况的确落后,女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6) [美] Josephine Donovan《女权主义理论》(韩文版),文艺出版社,1995。在“女性运动第一代”阶段中,把西方feminism思想分为两种趋势。首先是“启蒙自由主义的feminism”,以“天赋人权”为女性运动的宗旨,女性作为“人”在男性社会上崛起,主要思想的目的在于女性的政治和经济以及社会上的法律权利的争取以此追求男女平等,其次是“文化的feminism”,超越“争取权利”的范畴,更关注广泛的“社会改革”,该理论基于“母权中心的观望(matriarchal vision)”,强调“女性中心”的价值秩序。在西方,到了80年代以后,以“文化的feminism”为中心发展的趋势,参阅123页。朱莉娅·克利斯蒂娃把西方的“两代feminism”概括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参阅《性别诗学》52页。也就是,她以“启蒙自由主义的feminism”的“女权倾向”为中心评价了“第一代”,以“文化的feminism”的“女性倾向”为中心评价了“第二代”。由此可知,在“第一代”明显存在男女两性的“差别(有高低优劣的区分)”,因而女性解放的意义在消除“差别”的上。到了“第二代”,男女两性的“差别”转为两性之间的“差异(平等的基础上谈论区别)”。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中“女性”虽然具有“差别”的意思,不同于当今话语中的“差异”,但是它作为与男性对立的性别概念,有激进的意义。

7) 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443,444,459,407,473页,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

不过，特殊的历史情况也造就了特殊的（恶劣的）女性教育环境，从此培养了少数的女生，并孕育了极少的女作家。极少的女作家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敲打文学的大门，她们的写作自然反映了当时作为女儿的新女性状态。她们因新旧的冲突、东西方的碰撞而生成的价值体系引入家庭和社会的思索，产生了她们独有的接受方式，她们对社会的思索和对父·母性的再认识连接展开。

庐隐、冯沅君、冰心、石评梅都是学院出身的第一代的女作家群的代表，在她们笔下，或近或远地刻画着充满爱恋的母亲。永远的女儿石评梅心目中的母亲是她“永久倚凭的主梁”、她自己“破碎的灵魂”、“最终归宿的坟墓”⁸⁾，讴歌母亲是冰心创作中的一贯主题（冰心笔下的母性在下面进一步单独探讨），遭到母亲贬斥的女儿庐隐，却在千里之外的他乡留下了想念母亲的文字。尤其是，在冯沅君早期作品中母亲是主要主题之一，在这世间，母亲的爱是“唯一的、绝对的、神圣的”⁹⁾。她和冰心不同的是“多了一位自由恋爱的情人，这成了叙述人的二难选择”¹⁰⁾。对冯沅君来说，母性是一位像故乡一样永远憧憬的对象：“北京仿佛是我的情人，故乡仿佛是我的慈母；我便是为了两性的爱，忘记了母女的爱的放荡青年”¹¹⁾，又是同情：“添了无数的皱纹—为子女辛勤的遗痕”¹²⁾，而却要克服的对象。“潜母”和“母亲”之间插入的“女性”，在公共话语中赋予新女性新的性角色逻辑，在私人话语中解放了她们的性爱和感情。新女性在社会上一定程度抗拒母性的性角色任务，愿意发挥自己的才能，另外，生来就是“潜母”的她们，不顾敬辞的形式，大胆追求个人的感情生活。就这样，“女性”正对立于“母性”，作为“女性”的女儿冲突于父权制的母性。作为“潜母”的女儿是父权社会期待新女性的价值标准，作为“女性”的女儿是新女性自身要求的本位价值，新女性心目中的母性是理想化的“客体”，不是具体实现的“主体”。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尽量把母性隔开，却在精神世界中尽量把母性讴歌，把它当作一种“永远不变的纯粹”，来弥补现实生活中的缺乏。“母性性的憧憬”和“女性性的渴求”在冯沅君的母性书写中彼此隔阂着，隔阂得彼此占领了作品中明显二分化世界的两边，从而分别形成了“精神的虚构”

8) 屈毓秀、尤敏 编《石评梅选集》，《母亲》，8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9) 柯灵 主编《冯沅君小说 春痕》，〈慈母〉，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0) 同注9，孙晓忠 〈捣麝成尘香不灭〉，2页。

11) 同注9，〈慈母〉，28页。

12) 同注9，〈慈母〉，33页。

和“现实的真相”，这两者组成冯沅君作品的主要基调。与其相比较，冰心的母性书写是一种把“精神的虚构”移植到现实生活中，从而使两者合一的尝试。

冰心的创作，是寻求一种在平稳的抽象世界里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永恒”的主题。大海、母性、祖国、童心、博爱等主题，有效地避开了五四女作家们最敏感的话题“性爱”，具体形象化在形而上的观念世界。特别是，她的母性爱已经超越了五四女作家一般的“想念”，而达到了一种“崇拜”的程度。她对母爱的赞美受到她成长的幼年家庭环境的影响，总是唱不完的歌颂直接反应了她和亲母之间形成的紧密纽带。她把从温暖的家中体验到的母亲的恩慈厚爱，溶进到她的创作世界。赞成女性解放，摆脱封建束缚走向社会的冰心，却对否定贤妻良母表示有所保留：“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人”，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¹³⁾。对冰心来说，母爱与和睦的家庭是绝对的理想，这些理想和当时中国社会情况的结合，在文本中呈现母爱和新女性的结合，从此出现了现代小家庭中“现代式贤妻良母”形象群。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冰心的新女性有别于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一个挣扎在理智和情感间痛苦的灵魂”，是一个“男性神话体系中被理想化的女神”。

她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流露着一种神情，一种风韵，既流利，又端庄，好象白莲出水，玉立亭亭（……）男同学们对她固然敬慕，女同学们对她也是极其爱戴，我没有听见一个同学，对她有过不满的批评（……）请了C女士担任“光明之神”（……）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之下，C女士散披着洒满银花的轻纱之衣，扶着银杖。经过一番化装，她那对秀眼，更显得光辉深大，双颊绯红，樱唇欲滴。及至我们开始对话，她那银玲似的声音，虽然起始有点颤动，以后却愈来愈清爽，愈嘹亮，我也如同得了灵感似的，精神焕发，直到终局。我想，那夜如果我是个音乐家，一定会写出一部交响曲，我如果是一个诗人，一定会作出一首长诗。可怜我什么都不是，我只作了半夜光明的乱梦！（……）说她的丈夫是个很好的医生，她的儿女也像她那样聪明美丽（……）我们八九年没见面了，真是使人难以相信，她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好看！一样的年轻（……）我相信以她的人格和容貌

13) 冰心《冰心选集(1)》，〈我的母亲〉，32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的美丽，她的周围随处都可以变成光明的天国¹⁴⁾。

聪明、年轻、美丽、善良而且多才多艺的女儿，人生道路也极为顺畅。按照冰心的叙述，天国的美丽女神把这世界能够变成“光明的天国”。因此，这些女神般的新女性，首先着手改变家庭。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置于她人生观的中心，她不但有学问和教养，有别于旧太太们的无识，而且在家务的处理上也表现得勤劳能干，基于她的肉体劳动和精神照顾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两个家庭》中的亚倩和《我的邻居》¹⁵⁾中的M太太都属于这一类“现代式贤妻良母”，尤其是M太太，她有许多委屈却从不抱怨，温柔贤惠、吃苦耐劳、重伦常讲礼义，敢于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不亚于古老的模范母性形象。女主人公们视贤妻良母为天职和追求的人生目标，充满爱心的她们甘心献身，主动牺牲，区别与旧太太们的被动状态——不会理家、爱玩乐、缺乏爱心关怀。她们通过与丈夫心灵的和谐一致，为丈夫、家庭服务来间接实现自我价值。不仅如此，到了《我的朋友太太》中的L太太，形象变得更完美。她不再是纯粹的家庭主妇，在社会上取得了教员的角色，作为贤妻良母同时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她原来是个“清教徒”，不仅厌恶烟酒，而且作为已婚女子的她“常常赞美那些太太死后绝不再娶的男人”¹⁶⁾，但她亲眼目睹太太死后变样的T先生，主动给他介绍T太太的妹妹，促他结婚。作为新女性的L太太当初坚决反对丧妻的男性一定再娶的古老风俗习惯，是叙述者“我”看来最遗憾的一件事，但她通过T太太的死亡不但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而且表现得那么主动，她的形象变得更完美不过了，她是个名实相符的贤妻良母了。亚倩和M太太一样，新男性的L先生和L太太的关系充满了恩爱，夫妻双方的互相尊敬关系中，家庭气氛仍然温暖和睦，作品的基调一直在没有纠葛和矛盾的理想状态中进一步刻画“现代式贤妻良母”形象。女性意识空前膨胀的社会气氛中，冰心却着力描写了美满家庭和幸福的家庭主妇。这些全方位的“现代式贤妻良母”，如果家里有什么困

14) 同注3, <我的同班>, 338—341页。

15) <两个家庭>创作于1919年, <我的邻居>被入于1943年出版的特写散文集 <关于女人>一书中, 虽然两篇文章的创作时间隔了20多年, 也在这期间冰心结婚(经历过从潜母到具母的身份转换), 但是冰心在<两个家庭>中呈现出来的对女人的观点主线, 到了<我的邻居>, 不但没改变而且把主线更深入下去。因此, 笔者把两篇作品不分开讲, 并立探讨。

16) 同注3, <我的朋友太太>, 344页。

难也能够全部克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任何事情都由她一个人来承担，所以她的人格更高尚、完美无缺，她恐怕是平凡的女人永远当不成的童话般的梦想，浪漫的幻想。那么，在冰心笔下如此完美的小说人物，与当时社会普遍意识形态保持着多大相关性，不妨参阅陈学昭的一文：

他们看她们如一字不识的女子一样，以为她们是经济不能独立，仰给于男子，她们是男子所有，像奴仆一样的。于是这种有学问有才干的女子，也是不幸的被困压在这奴性未除的冒称中国的新男性之威权下，做了牺牲！（……）我不禁回想到四五年前一般新男性所发的高论了。那时候，他们以为改革黑暗的家庭，树立优美的家庭，只要自由恋爱，与有学问有才干的女子结合，思想、性情、人格上的融洽。这些女子她们有被男子尊敬的资格，不要说是平等，这种家庭，就是我们所见的现在的所谓新家庭，应当是幸福的了，其实不然！初恋爱的时候，自然是男子尊敬女子，女子也钦仰男子，但到了一有夫妇的形式，一有了小孩，男子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成了他们两者结合中的主权人物，一起都要受他们的指使，不能保持原来对于女子的尊敬¹⁷⁾。

冰心的文本中，不但没有卢隐、冯沅君在时代和女性的思维当中遭到的“尖锐的矛盾”和“沉闷的纠葛”，而且没有陈学昭对现实的“清晰的直视”，她又对凌叔华、白薇、丁玲浑身发出的“真挚的呼喊”视而不见。从《两个家庭》开始一直到《关于女人》，她一贯回避女性视角的审视：“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女性的自我评判或自我分析”¹⁸⁾，尽管十分理解她“得天独厚”的身世背景。五四以来的中国，在新男性和新女性的结合之中确实确实存在着父权制的阴影，正因为此，新女性的苦闷比旧太太们深厚得多，但是冰心的文本总不能放弃讴歌小家庭、赞美母性的牺牲。“现代式贤妻良母”不仅在家庭，也在社会中表现得十全十美，像“超级女人 (superwoman)”¹⁹⁾般的完成母性的性角色任务。她所提倡的“现代式贤妻良母”主题到了《我的学生》，再套上一个为祖国甘心牺牲的“花木兰式的女英雄”形象。女主人公S漂亮大方，机敏过人，不仅功

17) 陈学昭《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新女性，37页，第二卷，第一期，1927。

1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7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19) [美]《The Superwoman Syndrome》(韩文版)，22页，wuadang出版社，1986。母性在社会领域中承担着“全天工作职责”的责任，同时在家庭领域中又承担着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的“性角色任务”，父权社会向职业母性要求“超级女人”般的万能角色。

课优秀，而且多才多艺，在大后方，又教英语，又有治家本事，一个人能干六七人的活，也不甘示弱，但终因献血抢救一个病危的女子失血过多而离世，是一位完美无缺的母性。女性写女性已经成为文学传统的四十年代，冰心的女性意识仍然在“潜母”和“具母”的封建女性二分法模式之中，与往前不同的是，她把旧太太替换为新女性。她精致包装的“现代式贤妻良母”，不再是被强迫而担任的性角色，而是女性为了完成女性本位价值，自己主动选择的女性的最高表现。她的视角脱离了宏观的父权制机制，只限在个体小家庭的范畴里观望母性的结果，造就了母性一个人的新女性化就能够革新对旧家庭的盲目信赖，好象美丽女神般的新女性把这世界改变得像光明天国一样。换言之，她视女性为社会性角色，视母性为家庭性角色²⁰⁾，因此她认为社会上的新女性和由她料理的家庭，都可以在没有任何冲突的情况下解除矛盾。但是，母性面临的众多问题不是母性个人的“不忠实”产生的，而是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整个父权制造就的产物，绝不是母性一个人的“新女性化”就能够改变的旧家庭问题。再说，按照陈学昭的分析，男性的女性解放思想本身不但带有忽略女性性别特点的局限，而且他们对具体婚姻生活的理论和实践迥然分隔，更不可能摇身一变而解决母性和家庭的问题。冰心的母性思考自然包含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结婚和家庭仍然成为潜母的最高价值，于是潜母对男性的依赖还是极大。第二，约束于“双重角色”²¹⁾的具母，工作上相对非专业化，只能担任次要的职能，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竞争力。第三，完美无缺的母性形象，给母性带来了加倍的性角色负担的负面结果。

冰心的《关于女人》“借男士之口，实际上无异于借来一种男士之女性观，而这一借来的过程以及借来后的创作结果，显而易见地包含着某种屈服于秩序的意味”²²⁾。反封建的五四时期的女儿冰心，在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和新女性的结合过程中，却辨别不出自然母性的纯洁和父权制式母性主义的污染，她的女性主题反过来弘

20) 陈 苇 <女人：真善美的统一—评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75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第3期。作者认为，冰心的“贤妻良母”只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而已。

21) 谭敏常、信春鹰 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译义》，9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按照双重角色 (dual role) 的解释，当夫妇双方都是全天工作，丈夫很少花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做家务。由于女人的工作一般都低于男人，因此她们在外面的工作往往被低估了。

22) 同注18，75页。

扬“母性主义”，相对扼杀了“女性的本位价值”。也就是，她看不透女性和男性之间现存的差等，而采取了一种无性的视角，即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角度。冰心由此倡导“爱的哲学”，宣扬“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其大致的组成部分是母爱、儿童、自然，她“过分夸大母爱、童心和自然的神奇力量，企图从母爱的深沉、童心的纯真、自然的壮美中找到精神危机的避风棚”²³⁾。不仅如此，缺乏性别意识的“爱的哲学”里所提倡的母爱，不仅仅具有脱离时代现实而沉醉于个人趣味的负面意义，更主要的误解是，她已经倾注于男性视角的母爱无意或有意地代言了男性话语，并从中误导了现代女性意识的成长道路。漠视性别意识的男女两性的人道主义，如果在文本中成为评判性别的视点，难免漏出其逻辑的“虚伪”，冰心却从“虚伪的人道主义”出发审视女性的结果，导致了使母亲回家²⁴⁾的“贤妻良母主义”以及使母性万能的“superwoman syndrome”，这都是违背女性本位价值的父权制的“母性主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冰心，对母性的一些写作，在当时的话语圈里像五四的男性先驱们一样，虽然具有反封建的女性解放意义，但只限于现象分析而不掌握内在力量的洞察力，产生出了“现代式贤妻良母”的新母性主义，恰恰迎合了父权制的母性主义理论。

3 她们的挫折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注目母亲和女儿的结构化，母亲和女儿的屈从地位不是分开两立的，而是在父权主义之下捆在一起的。在理论上，父权制指示着父性的支配，但在实际上意味着“男性优越”、“女性劣等”的体制。男性的支配和父性的支配不一定一样，但是，对母性而言，男性的支配和父性的支配是同一的。因为父权制重视父子关系，作为养育男孩子的母性也是在男性的统治之下²⁵⁾。所以，父权制的母性主义起了

23) 青平 <析冰心早期作品题材与其创作心理定势>，87页，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第5期。

24) 同注21，342页，妇女回家论 (Women returning to their family-life) 按照男女性角色分担逻辑，母亲为了保证男子就业，应该回家，回到家里做家务，支持丈夫、养育儿童。

25) 薛鞠 Kim HyunWoo <对母性理论的探讨>，238页，釜山女子大学校论文集，第44辑 (师范大学篇)，1997。

巩固女性屈从地位的作用。这一母性主义通过强调母性的重要性，使人类无意识地接受女性更适合子女养育的神话²⁶⁾。依据女性主义心理学者Chodorow的说法，母性不会因生物学的决定论而决定，而是随着历史进展慢慢形成的结果，反映了社会文化的价值以及态度。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是在“父与子”的对抗中体现出来的自由意识，那么五四退潮时期的女性意识，则在“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中体现出来。在五四退潮后的二十年代，觉悟了的新女性虽然已经从家庭冲向社会，但面对的却是一个更大的异己的存在。她们没有出路，又无所作为，徘徊、彷徨、苦闷、孤立、无援。主人公的一切努力往往是徒劳的，现实的嘲弄又尖刻无情。在个人和社会矛盾的时代背景中，赞扬贤妻良母的母性主义仍然深深约束着大部分的中国女性，这对新女性也不例外。“个人”、“社会”、“家庭”，这三者之间的冲突一直困扰着新女性。

“究竟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攻究学问、改造社会？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良妻贤母的责任？”（……）为妻为母既然是人权，自无讨论之必要，但是现在有一般女子，唱独身主义，或则愿意终身尽力于学问，或则愿意终身尽力于事业，而不屑为妻为母的，是什么缘故呢？

这必因觉得为妻为母的困苦太多，而想逃避，而想抵制，或者是生性不适合于为妻为母的，觉得为妻为母的范围太狭，而要求社会事业上的活动。在中国素来受礼教困缚受男权压迫的现女子，愿意献身给社会、学问等等的，这个是觉悟，是反动²⁷⁾。

陈学昭显然认为，女性有权自己决定是做贤妻良母还是致力于学问事业，进而，在“女性”和“母性”和“人”之间的矛盾还没解开的时代话语当中，主张新女性拒绝母性的行为是一种反抗。她们的反抗是对整个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抗。反抗的意志往往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方法，一种较为“过分”的理念，自然带来了背叛“本意”的负面效应。五四女作家在头一次接受的“女性概念”的冲击下，较为轻易丢弃自然母性“也只是对男人的逆反和批判。这多半是一种妇女解放过程中反其道而行之的矫枉过正，

26) [美] Adrienne Rich 《OF WOMAN BORN -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韩文版)，平民社，1995。

27) 同注17，35-36页。

同时更带有对女性何去何从的迷惘²⁸⁾。这些“矫枉过正”的女性主义过渡期现象，覆盖了整个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也许一直连续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着仍然处于过渡期状态的女性主义本身的问题。

如果说，现代女性文学对于母性的思考，在基于家庭和女性本位价值的话语中，倾向于解剖家庭的阴影而追求实现女性自身问题，那么到了当代，女作家打破了原有的家庭概念而要建立新的家庭概念。比如，“女性家长家庭”，即“偏母家庭”、“女性单身家庭”、或是“女性姐妹家庭”等，在现代女作家文本中还是对立的男性，在当代女作家的文本中明显地消除，连作为伙伴关系的男性都失去了生命力量。关于女性本位价值问题，也超越了与男性平等的思维范畴，着重探讨有别于男性的女性特点，从此谋求改正女性的误区，同时显现出女性的优越。当代母性话题的极端表现，在于已经超越了男女两性的基本模式。过于沉浸于女性。但是，她们拒绝的是生理学范畴里的母性，但却包容了社会学的母性性质，比如母性的照顾本质 (mothering)、博爱精神、珍惜和平、温柔忍耐等优点。不可否认，女性主义文学正迷惘在烟雾里，但也不可抗拒其宏大势力的膨胀，彷徨是一种探索，看起来也许散漫的步伐是一种多方面的开路，它是尚未结束的，还在继续的写作。从而可以得知，在现代话语圈里，母性对立于男性，也对立于女性的性角色，“女性”在现代话语里带有比较激进的女性意识，母性相对来还是限于古老的贤妻良母话语，“女性”和“母性”是一种新旧的对立，或是一种激进与缓慢的对立，女作家在这些矛盾中进行写作。就此而言，庐隐的《何处是归程》和凌叔华的《绮霞》、《小刘》正是代表性的作品。

《何处是归程》是以三位新女性的谈话构成的小说。结婚、出国、单身主义、热心于社会事业、都不能成为她们的最终归属。已婚的少妇把自己比喻成“时代的落伍者”，并且描写婚姻道：“月光的洁幕下，恋人并肩的坐在花丛里，一切都超越人间，把两个灵魂搅合成一个，世界尽管和死般的沉寂而他和她是息息相通的，是谐和的 (……) —— 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他们是为了家务的管理。和欲性的发泄而娶妻，更痛快点说吧，许多女子也是为了吃饭享福而嫁丈夫”²⁹⁾。不仅

28) 同注3, 190页。

29) 李杰编《庐隐小说全集(上)》，〈何处是归程〉，259页，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作家全集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结婚的情况如此，当时对参与女性解放运动的女性的看法也不太好，把她们视为“拿着妇女运动招牌，借题出风头”，这些女性不知受到多少嘲笑和多少谣言。因此刚刚从国外留学回国的玲素“只悄悄的打算盘”，她想着“怎么办？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并不知不觉叹息道“好复杂的人生”³⁰⁾。《小刘》中的小刘也是婚姻的受害者。上学的时候反对“贤妻良母养成所”的学校，而甘心当“小刘军师”的女主人公结婚以后“苹果一般的腮”变得“黄蜡色”，“那黑白分明闪着灵活的双眸”变成“这混浊无光的眼儿”，特别是她见了十几年以前的老同学也“面上堆了不自然的浅笑”。穿着油泥肮脏衣服的女人在充满丑味的屋内，除了一大堆的孩子以外还有身孕的身子手忙脚乱。小刘很慈爱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孩子，这明明是母亲的眼神，不过这母亲已经变得像个枯燥的树叶一样，谈不上“白胖的身子抱孩子的母亲”，更谈不上是个人。《绮霞》的女主人公绮霞，长期处于练琴和管理家务的矛盾之中，终于决心离家到国外学琴去了。过了五年后，绮霞完成了学业回国，但是丈夫已经与别的女人结婚了。绮霞虽然得到了她所心愿的学业，但却失去了她的家庭，她只能无所归宿，心绪茫然，夜夜拉琴。

III 结语

女作家亲眼目睹着“不太理想”的种种母性形象，从而感到更苦闷、失望、彷徨。因此，她们的写作在“何去何从的迷惘”之中着重倾向于这些苦闷的话题，反思着五四的新思想给她们带来的所谓女性解放的局限，同时寻求着总是比男性更复杂的女性问题的解脱之路。庐隐、石评梅、冯沅君³¹⁾心目中的母亲能给她们供及“母爱的无限力量”，但是她们再也不能像母亲一样生活。她们虽然总是牵挂母爱，但是她们在怀念、同情母亲的过程中发现母亲所处的遭遇，逐渐觉悟到自己和母亲的客观距离，尽

30) 同注29, 262页。

力摆脱母亲而向往超越母亲的另一种女性或母性。她们在文本里讴歌母亲的原因，首先是她们确实肯定母爱的极高价值，其次，她们脱离了母亲的期望，愿意作实现自身价值的女人，她们置身的这种环境产生出一种“罪恶感”。她们的这种“罪恶感”使她们不能果断地切断与母亲的联系，但是对于父权制的母性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感，作为女儿的她们只能从理想化母亲得到力量，但在实际生活中总是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新女性对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争取，不完全意味着幸福美满家庭的保障。在男性的意识形态依然，母性的性角色依然，社会中父权制的机制也依然的环境里，满怀希望的新女性走近了“娜拉的家庭”，她们才觉察现实，粉红色的美梦就已经彻底毁灭，毁灭得如此茫然。她们通过作母亲的经历逐渐认识到，女性解放不仅仅因为解决两性之间的感情和意志问题。而获得解放，而且还要解决“具母”的实际问题。从此，女作家唤醒了女儿时代的幻想，把目光逐渐投向宏观的父权制机制。时代的莎菲们认识到，女性教育的普及、女性地位的提高、新家庭的出现无法解决结婚和母性性角色分担的现实情况。于是现实的矛盾和纠葛，逐渐转移到对于作为根本原因的父权制机制的思考。这些思考伴随着女作家本身的身份转换，她们的写作着力探讨母性的实体问题。

(完)

《参考文献》

冰 心《超人》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年初版排印，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冰 心《寄小读者》据北新书局一九三一年十一版排印，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丁 玲《在黑暗中》据上海开明书店一九二八年初版排印，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丁 玲《丁玲文集（1—1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柯 灵 主编《冯沅君小说·春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李 杰 编《卢意小说全集（上·下）》，20世纪中国小说经典作家全集丛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

- 吳福輝、錢理群 主編《丁玲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 譚兢嫻、信春鷹 主編《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匯譯義》，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
- 陳學昭《現代女子的苦悶問題》，新女性，第二卷，第一期，1927。
- 李 敏、王福康《中國婦女學》，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 呂美頤 張永福《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婦女研究叢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 孟 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鮑曉蘭 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 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 王 緋《睜着眼睛的夢》，作家出版社，1995。
-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叢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37, 5) 1998，影印第一版。
- 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
- 屈毓秀、尤 敏 編《石評梅選集》，山西人們出版社，1983，9。
- 陳 葦 <女人：真善美的統一體—評冰心筆下的女性形象>，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97，第3 期。
- 青 平 <析冰心早期作品題材與其創作心理定勢>，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4，第5 期。
- 〔美〕Josephine Donovan《女權主義理論》(韓文版)，文藝出版社，1995。
- 〔美〕Adrienne Rich《OF WOMAN BORN -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韓文版)，平民社，1995。
- 〔韓〕Kim Hyun Woo <對母性理論的探討>，釜山女子大學校 論文集，第44輯 (師範大學篇)，1997。

〈국문제요〉

중국 현대문학의 첫번째 10년에 해당하는 시기를 주로 활동 무대로 하는 여 작가군을 일반적으로 제1세대 여 작가로 구분하여 명칭한다.五四 운동을 전후로 하는 시대를 창작의 배경으로 하는 여 작가들은 여성이라는 새로운 개념을 받아들이게 되고 사회적 성의 해방을 맞이하게 된다. 그러나 신세대 여 작가들의 신분은 아직 “미혼의 딸” 들로서 그녀들의 여성적 자각은 자유연애와 자유결혼에 머물러 있는 상태로 사적 영역인 가정과 어머니라는 여성 전반에 걸친 고민에 대해서는 여전히 혼란의 시기를 배회하고 있는 실정이었다. 그녀

들에게 어머니는 극단적으로 부정되어야 할 대상이거나 동시에 한없이 숭배되는 타자적인 대상으로서 존재하는 현상은 당시 여 작가들의 “딸”이라는 신분과 모종의 관련성을 갖고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본 논문은 “딸”이면서 동시에 모성을 잠재하고 있음으로 그 가치를 인정 받았던 존재로서의 제1세대 여 작가들의 소설작품을 그녀들의 여성의를 중심으로 연구 분석 하였다.

關鍵詞 : 딸, 어머니, 가부장제, 해방, 사회적 성, 양성, 차이와 차별